

陈云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主编 金冲及 陈群
副主编 曹应旺

三

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云传

(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主 编 金冲及 陈 群
副主编 曹应旺

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卷目录

- | | |
|---------------------------|--------|
| 二十四、中共中央副主席 | (1005) |
| 二十五、兼任商业部部长 | (1042) |
| 二十六、改进经济管理体制 | (1079) |
| 二十七、检讨反冒进 | (1117) |
| 二十八、面对“大跃进” | (1147) |
| 二十九、面对庐山会议后的继续“大跃进” | (1187) |
| 三十、解决农业困难与粮食紧张问题 | (1231) |
| 三十一、农村调查与煤炭冶金工业调查 | (1264) |
| 三十二、担任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 (1297) |
| 三十三、听评弹 | (1337) |
| 三十四、受“文革”冲击，在江西“蹲点” | (1366) |
| 三十五、协助周恩来抓外贸 | (1407) |

二十四、中共中央副主席

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筹备并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制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纲领的一次重要会议。

八大的筹备工作是从七届六中全会之后开始的。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同时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大会的四项主要议程和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大会的四项主要议程是：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七届六中全会后，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刘少奇负责工作报告（后改为政治报告）的起草，邓小平负责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周恩来负责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起草。陈云除了参与三个报告的起草工作外，主持研究党的八大选举和中央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二十人委员会的第一召集人。他为提出比较合适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

八月二十二日、九月八日和十三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三次会议，通过八大的日程安排，通过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通过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些，标志着八大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九月十三日，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六十二人出席会议，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省市委书记三十七人列席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谈了下一届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他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毛泽东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不下地了。”他请与会者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还请与会者向八大代表们征求征求意见。

七届七中全会提名的一位主席、四位副主席，就是原来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陈云对自己被提名为副主席深感不安。他在会上说：“这四个副主席中间有我一个，我考虑过，我现在当书记处书记是补了弼时同志，我觉得我这个料子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我。”彭真当即插话道：“主席他们几个人不在，你常常代理，代理好久，事实已经证明可以。”邓小平对他被提名为总书记也表示：“一不行，二不顺。”会上，毛泽东在称赞邓小平后，对陈云评价道：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

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①

这是对陈云的总体性评价，说得十分中肯。

八大筹备过程中，在思想理论上的主要成果，是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这个讲话，提出了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

《论十大关系》是由毛泽东集中概括而成的，也是包括陈云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座谈会上部署八大准备工作时说：“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我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谈，请你们准备。有材料请你们送一些来。”^②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三十七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了解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问题，为起草八大报告作准备。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一九五六年初，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得知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十分赞成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从二月中旬到四月底，他也用这种方法，先后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委的汇报。

陈云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这些汇报会。根据记载，主要有：

三月二日晚上，陈云同周恩来等参加听取地方工业部和轻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三月四日，同邓小平等参加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

三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同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听取李先念对财贸工作的汇报。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同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听取商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同周恩来等参加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汇报。

四月九日下午和十日下午，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参加听取财政部负责人的汇报。

四月十一日下午，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参加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陈云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向重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处理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不主张照抄照搬苏联的做法。例如，他在不久后谈到中苏两国对资本主义企业采取不同政策时说：我们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采用没收政策，而采取赎买政策，也就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恢复经济是很有利的。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生

产人民日用品的轻工业。有了日用工业品与农民交换农产品可以加强工农联盟。有了日用工业品和农产品，可以供应城市的需要，供应全国人民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在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物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而在苏联，“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把资本家的工厂统统没收了，那时民生日用品的供应很困难”。“瞿秋白同志亲自告诉我，在苏联他要买五个扣子，还要打报告到扣子生产委员会，领了一年才领下来。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买五个扣子是不是要打报告到中央委员会呢？不要的。我们也有些同志到过苏联，我也到过苏联，一九三五年我去的时候革命已经胜利十八年了，但在苏联的百货公司里摆的东西还很少，除了一些香水、花露水以外，东西并不多。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他们说中国百货公司的东西很不少。”^①

就在毛泽东开始听取各部委汇报的同一天，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不赞成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全盘否定斯大林，但认为应该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走适合各国自己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他提到的苏联教训主要有：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俄罗斯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等等。毛泽东认为，我们对一切民族、一切

^① 陈云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工会基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8日。

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称赞陈云管理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地学苏联，而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据薄一波回顾，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曾指出：“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①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期间，陈云应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邀请，于四月一日至六日去越南进行为期五天的不公开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为数极少的单独出访。当时越南正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中国和苏联都派专家到越南帮助建设。在派中国专家到越南工作的问题上，陈云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同王稼祥、李先念、叶季壮、方毅讨论后，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为加强在越专家与技术人员的领导与管理，拟在对外贸易部设立“对外经济联络局”，“在越设立一派出机构”，称为“对外经济联络局驻越南代表处”。“派出专家应少而精，我们在业务上没有什么把握的部门不派”；“我们在业务上虽有把握，但估计越方已能独立工作的部门也不派”。“除了管理机构及某些专家留越时间较为长期外，其他一般专家及技术人员，均以订立短期合同为宜”。关于同苏方专家的关系，陈云说：“中苏双方都不要提出以中国或以苏联为主的问题，而应强调由越南自己作主。只要越南自己作主起来，事情就好办。”中国专家和苏联等国专家，“在越工作尽可能地加以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

分工”。^① 中共中央同意陈云的上述意见，并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提出：“拟在越南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局驻越南代表处，成为驻越南大使馆的一部分”，“拟任命方毅同志担任该代表处的代表”。^②

三月中旬，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通知，米高扬将在三月底到越南作公开访问。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说：“根据去年我们约定的，我们决定派陈云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米高扬同志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去河内。考虑到陈云同志不需要参加公开的集会，也不需要由苏、越、中三国发表什么共同的文件，所以，我们意见，陈云同志这次去河内将采取不公开的形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意见通知了苏共中央。”^③ 越南劳动党中央立即复电中共中央：“欢迎陈云同志以不公开的形式来河内。”^④ 为准备这次访问，陈云致电方毅，请他在中国专家中间，“收集一下越方政府可能提出的有关经济和其他问题，以便到达后事先研究一下”。^⑤

四月一日下午四时四十分，陈云抵达河内，受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热烈欢迎。胡志明主席亲自将一束鲜花献给陈云，同陈云拥抱。当晚，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设宴招待。宴会后，陈云与胡志明进行交谈。在谈到中国专家在越南的工作情况时，胡志明说：“中国专家工作是好的，但是关于许多问题应该发表意见，因为越南劳动党实在没有经验。专家方面提些意见可以帮助越南劳动党在决定问题时作参

① 陈云给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1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给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报，1956年1月28日。

③ 中共中央给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报，1956年3月20日。

④ 越南劳动党中央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56年3月22日。

⑤ 陈云给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转方毅的电报，1956年3月20日。

考。当然正如毛主席说的，最后决定应由越南劳动党政治局自己做，但中国专家应提参考性意见。近来中国专家过分谨慎了。”陈云说：“中国专家能看得到的意见是应该提的，所提意见不一定正确，只供越南劳动党中央参考。”他还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认为对于一切问题不是什么中国专家为主，必须以越南劳动党政治局为主。”胡志明同意陈云的这个意见。^①

四月二日下午，米高扬抵达河内。从这一天起，到四月五日，陈云和米高扬同胡志明等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五次会谈。这五次会谈，都是米高扬主讲，陈云只作一些插话。在这期间，陈云还应邀单独同越南财经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三次会谈，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越方之所以要安排陈云的这四次会谈，因为他们知道陈云在中国是主管财经工作的。他们向陈云提出了九个有关财经工作方面的问题，请他解答：工业化道路、农业增产措施及开荒、改造私营工商业、稳定物价、资金积累、货币流通量及货币发行、财经机构的设立等。后来，由于米高扬在越南的停留时间缩短了一天，陈云只回答了前三个问题，没有时间再回答其他问题。对此，越方表示十分可惜。

关于越南工业化道路问题，陈云说：他到河内百货公司干部服务部参观越南商品后，得到很深的印象，这就是外国货主要是法国货很多，越南货很少，质量也差。陈云认为，如果说曾经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重工业，但还有一些轻工业的话，那末，可以说，曾经是殖民地的越南，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什么轻工业，因为那时法国人宁可输入法国货来榨取高额的利润，而不愿在越南本地发展轻工业。从越南的这种实际情

^① 陈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56年4月2日。

况出发，陈云建议：越南不要采取重工业和轻工业齐头并进的办法，也不要采取先重工业后轻工业的办法，可以选择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办法。可考虑按日用品工业、有原料并有销路的出口品工业、必需和可能搞的重工业这个次序来使用力量发展工业。日用品工业容易办，得利大，收效快。办这样的工业，可以为办重工业积累资金，又可以满足农民购买力提高后的需要，同时可以进一步解决城市职工的就业问题。^①

陈云访越后，越南提出请求中国援助十三个轻工业工厂的项目。七月十三日，周恩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十五次全体会议，在讨论援助越南问题时，陈云说：“今年四月我去越南看了一下，他们可以搞一点轻工业，积累一点钱，现在都是向我们买。”“轻工业长期规划由他们自己搞，我们派往越南的小组只是去研究十三个项目，只是就事论事，至于搞多少厂，总交货人如何交货等问题，等小组回来后再研究确定。”会议通过决议：“同意接受越南的要求，立即派轻工业小组去越南对他们请求援助的项目进行研究。”^②

陈云这次对越南的访问，在中越友好历史上写下浓浓的一笔。他在访问中强调的越南建设要由越南自己作主，要按照越南情况办事，他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议，使越南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胡志明、范文同等越南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曾多次会见陈云、交谈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

在四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月二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两次作《论十大关系》的

① 陈云访问越南期间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记录，1956年4月25日。

② 国务院第三十五次全体会议记录，1956年7月13日。

重要讲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主要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前五种关系都直接同经济建设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里涉及开辟一条跟苏联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也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对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开创性意义。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后来，他又指出：“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② 《论十大关系》成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贯穿于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经济报告等文件的起草过程中。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② 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八大筹备过程中，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总的目标的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具体到建设速度上却存在不同的看法。陈云是主张稳步推进前进而反对急躁冒进的。

一九五五年夏季以来，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是“小脚女人走路”，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在八大筹备过程中，毛泽东曾经提出：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在国际形势方面，毛泽东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加快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① 毛泽东还根据当时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高潮，提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②。

在反对保守主义、加快速度、要求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的思想指导下，一个个高指标的远景计划相继出台。远景计划的高指标又带动了年度计划、年度预算的冒进。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中，基本建设投资为一百一十二亿七千万元，比一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的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1955年12月5日。

^②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12月27日。

九五五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百分之三十点四，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一九五六年投资多百分之十二点四。但各方面自下而上地提出的要求仍在不断加码。据国家计委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一百五十三亿元，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八十亿元、二百多亿元，比一九五五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一倍还多，而这一年的全年财政收入却只能增长百分之九点二九，两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陈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推动下掀起的生产建设高潮，是高兴的，但又是比较冷静的。当时他兼任中共中央农业生产协作委员会主任，深深感到忧虑并经常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提高粮食产量以改变粮食供给落后于工业发展需要的现实。前面提到，毛泽东多次同他商讨如何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途径。陈云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到江南和其他地方进行过调查研究。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草案出来后，他认为整个文件“画龙点睛”之处是“四百、五百、八百”^①，实现这个目标“有可能、有希望”，但“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他分别提出了南方和北方的增产粮食的办法和条件。同时，他感到要真正实现农业四十条中规划中的粮食增产的速度，存在一个同国家财力是否适应的问题。

以后，一九五六年一月和二月中央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提出的各项计划指标越来越高，大大超越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特别是一月十日至二月七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制定的

^① 指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安排上更加要求过高过急。陈云深深感到，这样做将会突破好不容易才做到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局面。他觉得有责任向中央郑重提出这个问题。一月二十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这四十条的基本的东西是要靠群众的人力跟财力，不是主要地靠国家支钱。”“国家要有一定的投资，比如民办的事业要加以公助，这是必需的。但是，中央各部，各个地方，也不能开大预算。”“大预算是不合乎情况的。”他还说：“现在开两个会议：一个叫计划会议，一个叫财政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应该好好地讨论生产，同时又讨论财力。一定要使我们的生产得到发展，但是财政要得到平衡。”“毛主席讲的是什么呢？叫又好又快，又快，又多，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又省。”^①

二月八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对《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作说明时，批评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冒进倾向，并指出生产经营中品种减少、质量降低的问题。陈云作说明后，周恩来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还说：“决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

^① 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①国务院二月八日的会议及其决定，重点是纠正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急躁冒进，同时，对远景计划和年度计划上提早完成工业化的急躁冒进倾向也进行了批评。

这以后，到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前，陈云协助周恩来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解决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指标过高的问题，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下来，使它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

二月十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几天前刚刚闭会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把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了百分之六。陈云在会上说：工业高潮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了可能的，不叫“小脚女人”，超过可能的是“左”。二月二十八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经过压缩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由于各种指标的压缩难以一次到位，仍超过物力的实际可能，各部门间出现了争物资、争钢材的现象。陈云说：“过去吵财力，现在进到吵物力了。大家争钢材，表明我们的计划是很紧张的。”“各部门讲今年的计划（主要是品种计划和季节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需要注意。”^②周恩来支持道：“陈云同志说得好，过去吵财力，现在进到吵物力，我看以后还要吵人力。各方面能够提出问题，只

① 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2月8日。

② 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2月28日。